

# 朱子学研究的多元化与全球化

## ——纪念朱子诞辰 888 周年暨朱子学与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吴瑞荻

2018年10月20日至21日,“纪念朱子诞辰888周年暨朱子学与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成功召开。本次会议由朱子学会、中华朱子学会主办,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承办,厦门大学国学院合办,来自美国、德国、法国、韩国、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等海内外60多家单位最具代表性的90余位朱子学研究专家共聚厦大,讨论朱子学走向全球化的未来发展。学者们就前朱子学及朱子哲学研究、朱子后学及海外朱子学研究、朱子学的历史考察及其现代化三组议题进行了分组发言,并展开激烈的讨论,其内容涵盖范围之广、历史跨度之长,体现了朱子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本次会议形成了许多创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一、前朱子学及朱子哲学

“前朱子学”在此指朱熹以前儒者们的哲学思想。先儒们启发了朱熹的学术思考,甚至成为朱熹哲学建构中的重要部分,因此重新梳理、廓清他们的概念与思路,进一步探索朱熹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怎样的诠释与发展,才能知道其何以是当时儒学的“集大成者”。

北京师范大学的田智忠教授针对杨儒宾先生提出的“朱子似乎慎言德性之知”之问,从张载、程颐和朱熹关于“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论述的整体性中梳理出其强调或者是慎言德性之知的逻辑性。江南大学的包佳道教授探讨了杨时的儒学思想,认为其突出求道不离“洒扫应对”的生活伦常,综合了程颐“格物”说、程颢“反身”说而以“体验未发”的内向反身的直觉体验作为工夫要诀,强调求道、为道是知行一体。宁波大学的陈昊博士《重探延平之学“真相”》一文回归《延平答问》,认为延平之学兼动静体用、要“理一”更要“分殊”、要得

气象境界更需求工夫着力处,三者贯穿一致。

清华大学的陈来教授讨论了朱子《太极解义》的哲学建构,认为朱子的《太极解义》是其太极本体论和太极本源论的建构之始,不仅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正式作为哲学建构的主要依据和资源,把太极动静阴阳引向了理气哲学的开展,而且谋求太极与人极的对应与一致,更以“全体太极”为成圣成贤的新的内涵,形成了以太极为中心,集理气、性情、道器、体用为一体的一套哲学体系。

湖南大学的朱汉民教授讨论了朱子《中庸》学对中道的创造性诠释,认为朱熹的突出特点和重大贡献就是以“理”诠释“中”,故而能够从知行合一中拓展出知识理性,从主客合一中拓展出主体精神,从天人合一中拓展出形上天理。这一系列创造性诠释,推动了儒家中庸之道的思想创新和理论建构,《中庸》的哲学意义也得到进一步提升。长沙理工大学的王琦教授考察了朱熹以《大学》为思想框架而建构的“帝学”,认为其希望从为治的源头与根本出发,以儒家的价值理念引君于道,影响帝王的心性修养与政治实践,实现尧舜之治。

陕西师范大学的许宁教授聚焦于“关闽之间”,认为朱子对张载关学的理论意蕴作了多方面的展开,围绕“太虚即气”、“心统性情”、“理一分殊”等命题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诠释,推动了理学学理形态从北宋原创期到南宋高峰期的演进,促进了关学与闽学的交流会通。南昌大学的张新国老师考察了《西铭解》,认为朱熹贯彻了通过诠释周敦颐《太极图说》建构的哲学思想,其中的太极阴阳论、太极体性论以及理一分殊论中包含的理气同异与理气偏全论等值得深入阐发。

厦门大学的乐爱国教授重点讨论了“己立立人,己达人”是“仁”还是“恕”这一问题,他认为汉唐诸

儒“仁”、“恕”无别,将“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解读为“仁”,而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恕”统一;朱熹讲“仁”、“恕”有别,将此解读为“以己及人”之“仁”,而与“推己及人”之“恕”区别开来;今人解读多接受后者,可见朱熹的解读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川大学的陈建美博士则从经学史的角度入手,讨论了朱子对《论语》“乐而不淫”章的解释与发挥。

与会专家多集中探讨朱子哲学问题,其中的问题意识,多集中在朱子哲学本体论、心性论与工夫论三个领域。

首先是本体论的探讨。韩国中央大学的安载皓教授从“朱子的理可是本体否”这一问题出发,认为朱子的理基本满足可作为本体的三个条件,即不依靠任何他者而独立存在、所有存在的穷极根据以及包涵整个时空的形上者,在此意义上理可以是“本体”。韩国外国语大学的姜真硕教授分别从《近思录》的文献学视角、基督教神学的“宣布”(kerygma)角度以及《仁学本体论》的“存在(Sein)之澄明”角度对朱熹哲学的“道体”思想进行了重新思考与论述,颇具新意。武汉大学陈晓杰老师讨论了朱子的“主宰”之天,认为其“主宰”之天应指《尚书》中“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的“降”,即天创生万物以及周流运行这一行动,强调天之运行本身的合规律性。

其次是心性论的探讨。湖南大学的赖尚清教授认为从“仁”的角度来研究心理关系,是解决朱子哲学中的“心”是否属于“气”范畴的关键,并由此出发,重新讨论了朱熹的“仁者,理即是心,心即是理”以及牟宗三对于朱子哲学“心即是气”的批判。北京大学的李毅博士重探了朱子哲学“心”字的所指和基本含义,认为“心”是指“知觉之能”,此“知觉之能”是“附带知(思)能的觉(情(意))能”,又可以表述为“附带知(思)能的觉(行(宰))能”,这是朱子一切心论的牢靠而稳定的出发点。福建师范大学的陈苏珍博士考察了朱子对善恶本体的探讨,认为其将善恶看成伦理层面与自然层面的双重问题,进而寻求善恶本体意蕴的哲学建构。厦门大学的王凯立博士由“明德”概念入手,认为朱子之“明德”在“心”与“性”严格区分的基础上又明确了二者间的合一联系,因而证成一个“本心”的概念。这一观念撬动了朱子道德哲学的重检,使其开拓出更加广阔的理论面向。

最后是工夫论的探讨。复旦大学的郭晓东教授讨

论了朱子“小学”对其理解《大学》工夫的意义,认为“小学”与“大学”工夫相辅相成,无“小学”则“大学”工夫无根本,无“大学”则“小学”工夫难以圆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金刚教授通过《近思录》卷十二所展示的视野,以“病根”与“工夫”之间的种种问题为切入点,对理学工夫论的深层问题进行审视。华侨大学的杨虎教授在“感通”与“格物”的问题上,分析了主体性的感通层面的格物论,进而试图以一种仁心感通为基础观念的存在论来为格物论奠基,从中相应地发见本源的仁心与主体性挺立之奠基关系。广西财经学院的陈林老师梳理了“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之间的关系,认为关于朱子“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何者为先”的疑问是一个伪问题。中国政法大学的李春颖老师则对比了朱熹与张九成慎独思想的差异,认为这是心学与理学工夫论的根本分歧。

## 二、朱子后学及海外朱子学

学者们深入挖掘朱熹自身哲学体系的同时,其研究视野并没有停止向朱子后学延展。从时间上看,许多学者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对于宋、元、明、清四朝的朱子后学进行研究,试图勾勒出朱子学在我国历史中的发展脉络。

江西师范大学的邓庆平教授从“宇宙论”、“人心道心观”、“就身心上用功”、“朱子学道统论”四个方面对朱子高弟黄榦的儒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厦门大学的谢晓东教授对王夫之的人心道心思想进行了细致考察,认为存在前后两说:前说为互藏交发说,该说面临着性情不分的基本困境,而解决困境的出路在于回归朱子的人心通孔说;后说即人心通孔说,但与朱子有所区别,朱子认为道心是情,而船山则规定道心是性。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顾海亮博士以《勿轩集》为中心,讨论了宋末元初福建朱子门人后学熊和的理学思想特色。陕西师范大学的李敬峰教授讨论了明代朱子学者吕柟《四书因问》的诠释特质,认为其是明代中期朱子学与阳明学竞合消长的一个具体而鲜活的个案。重庆大学的朱学博老师通过对明代学者丘濬《朱子学的》的研究,认为他用体例、编目上的一系列巧妙布置,构建出一套以“下学上达”为宗的逻辑体系。杭州师范大学的张天杰教授则关注清初儒者张烈的《王学质疑》,从其“朱陆同异,乃陆之异于朱耳”的“朱陆异同

论”去探讨清初“由王返朱”的学风转换。北京中医药大学程旺老师抓住了“图示化解读和诠释《大学》”这一线索,讨论了朱子《大学》图解、其后学的辅翼以及朱子《大学》图在清代的回响等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的许家星教授从朱子对二程学派、朱子对自我、朱子后学对朱子前后相续的三重批判出发,讨论了八百多年来朱子学的自我转化与超越。中山大学的钟治国老师以程、朱至河洛阳明后学“格物说”的演化为例,指出了经典诠释的框架、理路、方法及具体义理内涵之演变,及其与思想史、哲学史之间的互动关系。华中师范大学的曹海东教授着重考察了朱熹、王念孙、王引之等人对类推这一诠释方法所作的理论探讨,说明清儒对经典的诠释方法是承宋儒遗规而光大于后。福建工程学院的李山河老师探讨了宋、明、清三朝的反朱思想,认为这些思想遵循了共同的内在逻辑,均建立在曲解或错解朱子思想的基础上,间接助推了朱子学的发展。

从地域上看,朱子学在东亚国家与西方国家的流传与发展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由此形成了朝鲜朱子学、日本朱子学和西方朱子学的相关研究。

在朝鲜朱子学研究中,人心道心论是讨论最多的主题之一。南昌大学的田炳郁教授探求了朱熹“人心道心论”及其宋学渊源,同时考察了朱子后学对人心道心的主要观点。韩国成均馆大学的崔英辰教授则将栗谷的人心道心思想与朱熹进行了对比,指出栗谷从正面批判了朱子晚年认为人心与道心具有“两个根源”的定论,而主张“一本论”及“同源而流二”;此外栗谷还引入了“本然之气”的概念来构建自身的理论,可谓开创了人心道心说新局面。另外,成均馆大学的宣炳三教授以栗谷学派的李柬为主要对象,研究了“湖洛争论”中朝鲜性理学的心学化倾向。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部的彭彦华教授探讨了李退溪“礼缘仁情”中的《易》学思想,认为退溪学《易》、讲《易》、述《易》完全是为了进修践履,在继承朱子的同时又有所创新,其所主张“缘仁情”而制礼的观点更是得益于此。

日本朱子学研究方面,湖南科技学院的王晚霞老师通过对江户时代的藤原惺窝、林罗山、山崎暗斋等学者的研究,考察了周敦颐“廉溪学”在日本的发展。同样限定于江户时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史少博教授则关注日本学者对朱子学的接受,以及此时的问题意识、思想表现和现实影响。此外,厦门大学的吴光辉教授梳理

了明治时期日本朱子学的流变,认为在朱子学转向“日本化”而为“儒教”的过程中,日本将自身置于东方与西方、中国与日本的文化冲突之中。福州大学的陈晓隽老师探究了日本水户学的“尊王攘夷”到福泽谕吉“脱亚论”的转变,认为这是朱子学“大义名分论”的逻辑转用,即作为“学问”的朱子学转向了作为“方法”的朱子学。

西方朱子学研究方面,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王论跃教授讨论了《中庸》的法文翻译及其朱熹《中庸章句》的作用,并指出《中庸》的法译者主要有雷暮沙(Jean - Pierre Abel - Rémusat, 1788—1832)、鲍吉耶(Jean - 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 1801—1873)、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 1835—1919)、于连(Francois Julien, 1951年生)、马修(Rémi Mathieu);这些译者都提到朱熹的《四书集注》及其对《中庸》理解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对朱子注的重视度并不相同。

### 三、朱子学的历史考察及其现代化

除了上述思想和理论方面的研究,与会学者还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朱熹及其后学之生活世界与行实,从文献学的角度探究朱子学相关著作之详情。

四川师范大学的蔡方鹿教授主要将南宋至近现代划分为四个时段,分别考察了朱熹对四个阶段蜀学人物和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所谓蜀学,是指巴蜀地区自古迄今的以儒为主、贯通三教的学术文化。河南大学的贾玉英教授考察了朱熹的救荒赈灾主张,认为他的主张以及在南康军与两浙路的施政策略推动了宋孝宗朝荒政制度的建设。西安交通大学的常新教授则着眼于宋代复杂的政治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态,讨论了朱熹在南康军与浙东“得君行道”的治理实践中受到的掣肘。西安石油大学的张瑞元老师研究了清代《正蒙》注本以及康熙年间科举考试内容,指出由于程朱理学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此时大量出现的《正蒙》注本均是“以朱释张”。

法国巴黎南戴尔大学的戴鹤白教授对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的内容构成、成书经过以及成书过程中的版本沿革作了细致的研究,认为《〈仪礼〉经传通解》是在朱熹领导下、由二十多位文人共同完成的作品,是面向广大文人读者、涉及礼法所有方面的大型古代礼制汇编,与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山东大学的陈媛老师考察了中韩两国各种朱子

《小学》及注本的版本情况,并由此角度揭示朱子学从南宋至19世纪末在东亚传播的脉络。华东师范大学的李慧玲教授对比较勘了上海图书馆藏康熙三十二年刻的汪佑《五子近思录》与施璜《五子近思录发明》,认为此刻本上的大量批注出自施璜之手,正是《五子近思录发明》的初稿。

随着科技飞跃所带来的巨大变革,我国社会呈现出多元的价值观念,先前的伦理范式受到了严峻挑战,由此带来的隐患也逐渐显露。近些年来,朱子学呈现出从书斋式研究走向现代生活的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当今的现实问题出发重新审视朱子学,一方面试图从中挖掘契合现代价值的思想以表明朱子学的现代意义,另一方面也希望朱子学研究能够尝试为现代价值困境提供一条新的出路。

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杰人教授反思了当代社会礼仪缺失的问题,通过对礼学史的梳理与对《朱子家礼》的阐释来消除人们对礼的误解,提倡秉持“随时裁损”之态度寻求重建礼学、恢复礼教的道路。厦门大学的朱人求教授则看到了中国文化中“家为本位”的特质,他指出,朱子构建了系统而缜密的“家哲学”体系,“天理”是其本体论,“仁、礼、智”是其核心理念,读书穷理、居敬涵养、修身正己、勤俭治家则是朱子的力行实践;家国同构、万物一体、宇宙一家是家哲学的最高境界。“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人文科学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厦门大学的和溪老师从哲学、宗教与人生三方面论述《朱子家礼》的终极关怀,阐明了儒家的一种生存方式。中山大学的康茜博士则梳理了朱子学的研究状况,对现代三类创新研究理路进行反思,认为礼学研究可作为朱子学研究的新方向,并提出朱子礼学的研究纲要。

厦门大学的陈玲教授认为,朱熹对自然现象的关注与研究及其“格致论”已初露向“科学文化”的方向推进

的思想和趋势,显现出理学的科学文化哲学。上饶师范学院徐公喜教授详尽地阐发了宋明理学的“理治”模式,认为此种治国模式从总体上说有理论性模式、实践性模式以及二者统一的模式,体现了社会治理的综合性与层次性。集美大学学报的杨中启博士则从反面致思,认为随着社会发展,现代视域下的朱子学存在形而上学之式微、礼俗制度之解体、内圣外王模式之断裂等困境,如何实现朱子学的现代化运用是问题的关键。

对于伴随全球化而兴起的多元主义与多文化主义,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田浩教授颇为认同,他从三个方面讨论了朱子学与多样性的关系:一是早期道学甚至朱熹自身的思想和哲学体系均存在多样性;二是朱熹曾经谴责那些重视实用性、利益和多样性的思想(如吕祖谦和陈亮)在现代世界可能更实用;三是现代朱子学研究者们表现出对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尊重,有助于从全球性视角考察正在发展的多元性对话。韩国建国大学的郑相峰教授则探讨了朱熹的“理一分殊”思想,认为虽然朱子形上思维与现代世界观离走甚远,但我们仍应该给“理一分殊”的伦理学层次上的涵义予以现代性价值意义。

会议闭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朱杰人教授主持,同济大学哲学系曾亦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郭晓东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蔡方鹿教授对各组发言成果进行了总结,并一致肯定了本次会议的成功。陈来教授进一步指出了朱子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强调了未来朱子学的研究应走向多学科的拓展与融合,应加强日本朱子的研究,多与日本学者开展深入交流。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在众多纪念朱子诞辰888周年活动中,本次国际会议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学术性最强,本次会议的成果体现了朱子学研究的最新动向,厦门大学作为当代朱子学研究中心在未来应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